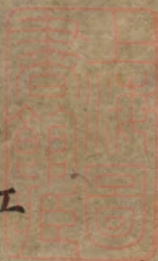


# 論建都

考風出

行發社版出南江





A541 212 0008 76688

# 目次

## 論建都

(一) 中華民族之發展由西北而走向於東南——歷代建都的移動是紀錄民族發展最正確的里程碑

(二) 從中國的歷史上看歷朝選擇國都的意向——從外國的歷史上看各國選擇國都的意向

(三) 對於建都應在北方論的意見——對於建都應以邊防為目的論的意見——對於建都應有利於開發論的意見——對於建都應尊重歷史傳統論的意見——對於建都應就生活艱苦地區論的意見

——對於幾何中心論的意見

(四) 從古今中外對國都的選擇上找出具有主導作用的條件——蘭州、西安、洛陽、開封、武漢、北平和南京的比較——應該根據戰後需要在南京、武漢與河南之間選擇

## (附錄一) 建都小論

從大處着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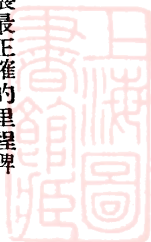
安內與攘外

「古已有之」

天子守邊疆

目

次



1615578

臥室

計劃

限度

生而知之與學而知之

「國防第一」

雅、健、深、雄

新宅

國家興亡

(附錄二)戰後建都問題



# 論建都

最近大家看着勝利漸近，熱烈地談到戰後建都問題。二十年來關於建都問題，在學術界原有各種不同的議論，而主要則不外下列數地：——南京、北平、武漢與蘭州。現在情勢不同，尤其是中華民族經過這一次長期抗戰以後，人口有了很大的移動，對外關係上有了重大的變遷，其他經濟文化諸條件也多，少不免有些異樣了，所以現在舊論重提，亦頗有意義。

不過現當辯論之初，大家不免有些像盲人摸象一樣，摸着什麼就對什麼來下結論，找不出一個頭緒來，所以或則主張建都應在北方得居高臨下之勢；或則主張建都應以鞏固邊防爲目的，外抗強敵；或則主張建都應具備利於目前甚囂囂上的開發西北的條件；或則主張建都應尊重歷史傳統；或則主張建都應就生活艱苦地區；或則主張建都應以全國地域上的幾何中心爲依據；莫衷一是。基此諸說立論，假定作爲建都的地方主要有北平、南京、長安、蘭州、武漢、重慶等數地；更有故作奇論，提出長春、台灣之說者。

我們在這個辯論中首先有一個感想，就是一個國家在國都的選擇上，至多只能有兩三個地方，而現在衆議紛陳，提出的地點多至七八個，未免是一種畸形現象。從中也不免有人先在主觀上得到了一個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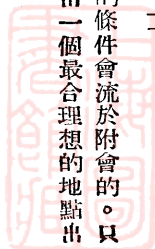
定，然後再找一切論據來注釋他這個假定，這種態度是不對的，這樣一切提供的條件會流於附會的。只有根據中國古代的史跡，參證外國的成例，適應現代中國的需要，才能比較出一個最合理想的地點出來。

一

我們不能數典忘祖，故須先自中華民族發展史說起，並從中觀察歷代國都遷移的軌迹。

## 中華民族之發展是由西北而走向於東南

中華民族之發展路向是由西北而趨向東南，此在學術界已成爲公認的事實。往昔不可詳考，我們試從周朝說起。周代以隴東和陝中爲發祥地，自後順黃河流域東下，一方面向北發展建立起三晉大國，一方面從河洛平原東漸，東至齊、魯，南及漢水。不過春秋時代的燦爛文化的範圍還不能超出黃河流域，到了戰國期間，才自江淮以漸及於楚漢。周末的咸陽的繁榮已不過是靠着「四面輻輳，並至而會」，至於商業的中心早移向黃河下游，「陶，天下之中，諸候四通，貨物交易之所也」。秦都咸陽的繁榮，也是靠十二萬戶的豪富的強迫集中而形成的，而當時如山東的鄒魯，江南的吳，長江上游的巴蜀、郢都，在史記上已被盛稱爲新興的都會了。秦室崩潰，劉邦羽鬪起於徐、沛之間；徐、沛屬淮河流域，在現代中國已屬於北方的範圍，但在當時對政治文化中心無關、隴說，却顯然已是南方了。這是北方人文中



心開始南移的一個初期的痕跡。

劉邦建立漢朝，仍據西北高原之險；其手下將相，雖已不乏產自徐淮的人物，但仍然是多數的關西人佔優勢。到了漢朝末期，江東孫家父子據長江下游而有間鼎中原之勢，且巴蜀與荊州也被視爲爭雄的要地了。晉代黃河流域爲異族所蹂躪，漢人大批被迫南移，於是南方文化更賴以大爲發揚，史稱此爲南北文化的調和時代。唐朝統一中國，恢復漢室的舊業，形成中國有史以來的最強盛時期，而長江流域以南更加積極開發，向被視爲蠻荒的珠江流域亦漸漸成爲文士詩人採拾的資料了。大概當時作爲政治中心的長安，完全依賴着潼洛通道及通巴蜀的棧道爲補給，繁榮氣象的東漸已使西北經濟大爲動搖而岌岌不可終日。所以一到宋室康王南渡，時勢逼得不能不以江浙爲中心，並開始向福建、兩廣移殖。

在此要特別提出的是，自東漢以至南宋這一時期文化南移的主導力量，不是由於北方異族的壓迫才不得不就於南方的末路，而是由於南方比黃河流域更具備適於生存的條件才發生自然移動的趨勢。更明顯些說，假使這一時期沒有北方的外患，南方仍然會繁榮起來，祇是不會像歷史上那樣的急速；而假使南方沒有具備更適於人類生存的條件，漢族也只有死守黃河流域，跟北方異族爭一個你死我活了。所以自此以後，南方文化經過東晉、南朝、南宋數度的灌溉與培養，乃浸浸然有取北方文化而代之之勢。

這一變化，經過明末又一度大流徙之後益見具體，更因海禁漸開，首先震動了珠江流域，於是洪楊崛起於廣西邊陲，而清室賴以一度中興的亦無非湘淮的健兒。再過五十年，珠江流域更成了革命勢力的中心，這一勢力自南而北，造成了近卅餘年來統一中國的基本力量。

這不是中國的北方與南方在氣運上有什麼轉變，而是南方文化追上了北方文化的必然的結果。

## 歷代建都的移動是紀錄民族發展最正確的里程碑

在中華民族這一由西北向東南發展的路程上，歷代建都的移動就是最清楚的里程碑。自然，這發展是錯綜的而非是刻板的，是曲線而非是直線的，所以歷代建都的移動也是如此。然而大致的趨向，却無疑採取着同一的步驟。

渭北平原既是漢族的發祥地，故建都的時期最長，直到唐朝方才結束。周都鎬京，秦都咸陽，西漢、後周、隋唐諸代皆都長安。然而其間有東周之遷洛邑，有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的許昌，有偏安江左的六朝，對於舊日政治中心地渭北平原已隱現着離心的趨向了。於是北宋的國都移到了汴梁，而其殘局則偏安於臨安（杭州）。元清以滿、蒙入主中華，得地理之便，定都北平；因其後可以結託舊有的根據地，前可以控制漢宗族中心的佔領區。但這顯然不能代表漢宗族所居的中心，尤其在當時是如此；所以到了民國以後，南廣州而北北平，南北對峙，互爭雄長，一到北伐成功，國都立刻因之南移。

於是可見歷代建都位置變遷之先後，以渭北平原為最早，河南平原次之，華北平原較晚，長江下游最近。都會的變易是民族發展路線的唯一表徵。

渭北平原雖是中華民族發展農業的處女地，但其後山東山西的鹽鐵，江南的舟楫與絲帛，因時而起，就大大開拓了民生經濟的領域；同時西北的舊墾地因天災人禍逐漸變為荒蕪，而古稱蠻荒的長江流域因水土肥美漸被經營成了錦繡的田園；等到帝國主義打開了中國的「萬里長城」，東南沿海地帶更立刻以經濟文化中心的新姿態而出現了。

民族遷移的另一表徵是人口集中地高的變動。若以黃河流域與長江流域爲南北的分界，在漢代，南方人口不過佔全國總人口十分之一；到了唐代，南方人口佔了十分之四；北宋時代，南、北人口數量已趨平衡，明代南方人口一變而爲十分之六；清代更增至十分之七。現代以渭北平原爲主要的陝西的人口不到了一千萬，而古代政治犯流放的嶺南邊荒，現在僅廣東一省就有三千三百萬人；至於江、浙兩省以稍大於陝西十分之一的面積，前者的人口却超過了後者五倍以上了。

必先明瞭了民族發展的史迹，才能談到戰後建都的題目。

## 二

建都自然是有條件的；是可以決定於主觀，而又必須是決定於客觀的。我們一方面可以現代知識爲基準來取決，同時也不妨多看看古今中外對於國都選擇的史實，並從中去瞭解許多自然演變的因素。

### 從中國的歷史上看歷朝選擇國都的意向

關於中國的部份，我們在第一節中已經詳細分析，所得的概念有三：第一、國都在歷史上常是跟着民族文化的中心而轉移的。這就是說，民族文化的中心地區在古代常被作爲選擇國都的對象。屬於這一種的例子最多。第二、他是不能不受着外族的壓力的影響的。這就是說，其地雖足夠建都的最完美的條件，然而爲避免外來威脅免得易於因而搖撼政治中樞起見，不得不內移到比較安全的地方。這內移之深度與外來壓力之強度成正比。這種例子也不少，周室的東遷，晉朝的偏安江左，宋代的南渡皆是。



第三、在異族鬥爭的結局中，戰勝的民族常常喜歡把國都放在足以威懾被征服民族的地方，如果戰勝者屬於少數民族，他不願株守其根據地也不願深入被征服者的內地，便把國都放在內外足以兼顧的所在。這一類的例子如蒙古族元代，愛新覺羅氏的清代是最典型的。

## 從外國的歷史上看各國選擇國都的意向

再看外國如何？

倘是一個國家的領土並不大而在其全國之地理人文諸條件是平均發展的，他們的國都常被選居於一國的中央，例如德國之都柏林，西班牙之都馬德里，波蘭之都華沙。這樣四面兼顧，便於統治全國。

如果一個國家一面是廣大的平原，一面是荒涼的山岳，他們的國家便不能位置於全國的中央，而只能偏於人口繁庶，交通便利，文化發達的地區，例如巴黎之偏於法蘭西之東北，倫敦之偏於英國之東南，華盛頓偏於美國之極東，里斯本偏於葡萄牙之極西。這在地理的位置上看雖是偏些，然而在人文的分布上看却依然不失其為中心，所以這種選擇亦是非常恰當的。

然而國勢的興替在國都的選擇上又得多加一番考慮。帝俄舊都是莫斯科，革新成功後就遷都彼得格勒，這是因為他需要打開窗戶，呼吸波羅的海上的空氣；可是蘇聯革命成功，又不得不內遷莫斯科以埋頭建設並避列強之鋒了。土耳其之遷都安哥拉和蘇聯遷都基於同一理由。還有歷史上若干向海洋求發展的國家，其國都則無不在沿海，荷蘭、葡萄牙、英、美、日、皆是。

倘使就此有限的材料來加以歸納：我們可以知道一個國都具有如下幾種作用：①強國用以利用對外征戰，②弱國用以利於防護；③爲求施政之便捷，儘可能求其位置之適中，交通之便利；④爲利於統治起見，其地又必在人口密集所在；⑤若干衰老的國家思古懷舊，墨守成規，則大都必趨於衰亡。

### 三

以歷史的先例，和近代各國的現狀爲依據，作者對於論中國國都的各家之說有如下之意見。

## (一) 對於建都應在北方論的意見

張君俊主張建都西安。他的基本理由是中國應先建設北方，然後建設南方。張先生首先提出佐證：「一切國富民強的都城皆在北方，一切國不富而民不強的都城皆在南方」。「倫敦在北緯五十二度，華盛頓在北緯三十九度，莫斯科在北緯五十五度，柏林在北緯五十三度，……至在北緯三十三度以南者則爲泰、緬、越、印、埃、伊、阿之屬。」很可笑的是張先生很受中國風水之說的影響。在北緯三十三度以北的國家，他的國都自然不能在北緯三十三度以南；而且若就某一國的自身地位來說，除柏林、羅馬、莫斯科在德、意、蘇俄居全國之中以外，華盛頓偏居美國之極西，倫敦偏居英國之東南。他們或則居中，或則偏東，或則偏東南；但他們却一定都基於一個共同的法則，都有不得不然的理由在。這一個共同的法則以後再講，總而言之，都居北方的國家，決非由於他那國家北方風水較好的原故。

張先生說南方民族皆受北方民族的支配，「任何優秀民族一跨進南方，便被南方地理環境所限制，

而成爲知體不平均發展的畸形民族，我們若要避免這種劫運，便不應建都南京。當今各強盛國家大都位於北方，而散佈在南方的幾全爲落後的弱小民族，張說似乎不無理由。可是我們若說南方諸民族多少會受些氣候的影響則可，若以爲北方一定有比南方怎樣好的風水，却並無根據。祇着南非和澳大利亞是南而又南的，土著是衰亡的了，但白種人到了那裏却照常能堅實地發展。張先生又必以南美劣於北美，北非和南歐劣於中歐和北歐這兩個例子來作爲北方之強的證明。然而我們若細究歷史發展的軌跡，第一、當新大陸發現以後，西方殖民美洲的大體上是兩大主流，英法德朝向北美，西班牙、葡萄牙朝向南美；固然在資源分佈上的確北優於南，但這在後來的發展上並不具有決定作用；具有決定作用的是，當時向北美殖民的民族都已多多少少受了產業發展的影響，開始了對原料與市場的需要，而向南美殖民的民族却還緊緊受着封建生產關係的束縛，只指望掠奪金銀珠寶便已感到滿足。所以英法殖民美洲的結果是更加速了產業的發展；而西、葡殖民美洲的結果是徒然使王室貴族僧侶滿足於金銀財富的增加，反妨害了他社會經濟變革的動向。自然，英、法、德趨北，西葡趨南的走向，在地理條件上有其必然性，可是假使他們易地以處的話，美洲的現狀也許會變得兩樣了。第二、我們不能忘記地中海是西方文化的搖籃，地中海周圍許多在古代具有燦爛文化的國家的所以一蹶不振，主要不在於他們所居南方之不利，而由於他們始終幽閉在地中海內；等到西歐的民族已向海洋上奠定了現代文化發展的基礎，他們才如夢初醒，却已趕不上去。不但地中海命運如此，連波羅的海也如此；不但歐洲如此，連亞洲的中國也如此。我們要尋求現代強大民族發展的歷史淵源，決不能純從地理的觀點來着眼，而須研究他們的古舊社會經濟結構被分解的先後。至於其位置之爲南與爲北，自然沒有什麼關係。

以言中國，張先生以爲「北方氣候宜於科學文化之發展，南方氣候只宜於高度農業文化之培養」。張先生應查一查中華民族自西北走向東南自然發展的過程，並看一看海洋開放以後東南沿海在中國所處地位之重要性。由於近百年來河北夙爲中樞所在因而成爲學府薈萃之區，也許就是張先生所見的「北方科學文化之發展」的形式，但是張先生如果再看一看近百年來中國海禁大開以後南華文化異軍突起，以及東南成爲國際市場的事實，實在不能說南方僅只宜於高度農業之發展。

同一主張的是龔德柏先生：「我以爲惟其較爲寒冷，且風沙乾燥，才適於建都。萬一南方須對東北西北方作戰，因不適於寒冷，只有慘敗。西安之寒冷風沙，我們以爲求之而不可得；且嫌其不甚寒冷。南方之兵，一到北方，卽成廢物，只有任敵解決。這次德軍在蘇冬季的慘敗，已足供我們的教訓了！」「南方與北方，溫暖與寒冰」，龔先生之說也是風水與天時那一套。我們所要告訴龔先生的是，蘇聯的軍政首腦絕對否認了寒冷決定戰爭的謬說，他們嘲笑寒冷將軍只是一個上校官而已；龔先生如果太迷信寒冷將軍萬能的話，他直要主張蘇聯的國都應該放在摩爾曼斯克或者亞爾干日爾吧。

## （二）對於建都應以邊防爲目的論的意見

大公報先從中國的歷史翻起：「王船山論宋之亡由於疏河北之防」；王船山更追論：「東漢之疆，不敵西漢，而無北顧之憂者，有黎陽之屯在也。天寶以後，內亂方興，不敵開元以前，而無山後之驚者，有魏博之牙兵在也」。又說：「自春秋以及戰國，中國自相爭戰，而燕趙獨以二國之力控制北陲；秦入外應關東，而以餘力獨捍西函，東不貸力於齊，南不藉援於韓魏，江淮以南則尤耳不聞朔漠之天驕也

。及秦滅燕代，併六合，率天下之力以防胡，而匈奴始大。漢竭力以禦之，而終莫之能抑。晉兼三國，而五胡競起。垂及於唐，突厥與契丹，仍相內擾。」這就是大公報建都論的歷史觀點。

王船山的這一段史論是不錯的；邊防固則無外患，邊防懈則外患迭乘，此為一定不易之理。大公報據此演繹：「宋以不防河北而亡。明成祖遷都北平，修繕長城，西起嘉峪，東極山海，皆置重防，以首都當要塞，以天子守邊疆，因有朱明二百多年的天下。終明朝之世，蒙古未成大患，直至思宗殉國時，真正的敵人尚限於山海關之外。滿清繼都北平，北收蒙古，西掌天山，疆域之闊，超越往古。」這也大致不錯，但大公報接着就論斷：「那都是首都近於邊防的成績。」大公報顯然把建都與建邊防兩個雖無多少相互關係的因素完全看作一個事體了。

邊防是一事，定中樞是又一事，我們認為不可併為一談。談到中國古代歷代的建都史，如上節所述，我們有三種看法：第一、基於中華民族發展由西北而東南的事實，歷代均有其文化與經濟的中心地域；在唐代以前，古都大概不出黃河中游的範圍；唐代以後，因黃河下游與長江流域的繁庶，「八水繞長安」的盛況頓成陳跡；及至宋代以後，北平 and 南京又應運而起。這一個發展的路向，西域異民族的壓力只是次要的原因，主要的問題是人類的主觀拗不過地域因人文的變化。第二、中國統一之國都建立北平以元代為開始。元代的統治者不是漢人而是漢北南遷的游牧民族，而北平恰為南方農業社會與北方游牧社會之分水嶺。在當時的漢人立場看，這是偏向，在當時征服了漢家的蒙古宗族看，這真是得天下之中——北與其原來根據地不即不離，南可以控制中原廣大的地域。所以到了明代，雖然一方面因北陲已告安定而因襲了前朝的舊都，到底也需要留一個陪都在南方的長江流域了。清代和元代一樣，北平又成為漢

家與滿家的分水嶺。他爲了不願遠離故居，自亦以建都北平爲得計。民國肇建，革命勢力導源於南方，民族的中心，因歷史發展而轉移；且不說南京是最適宜的首都，而北平到底也失掉了奠定中樞的意義。第三、尤其重要的一點是，歷代遷都偏安是國勢衰弱的結果，不能看作是衰弱的原因，建都邊陲（這邊陲自然是就東部說）是國力强盛的結果，却不是國力强盛的原因。引申言之，國力强盛而首都內遷不致有損其聲威，國力衰微而置都邊陲却不要一夕數驚，疲於奔命。南宋之南渡，是因爲在汴梁再也立不住脚了。唐代雖然黃河下游已漸繁庶，但長安不失爲威鎮西北的好所在，可是到後來國力轉衰，到底也就站不大穩。倫敦之都於不列顛東南隅，因爲那一則是三島精華之地，二則是軍事經濟向外擴展的最好出發點；基此同一理由，日本一到國力足以問鼎海洋的時候，他的國都便從西京遷到東京。美國以地域之大，不都於安全的西部山地，却置於西臨大西洋的沿海；而帝俄可以據彼得格勒以傲視於波羅的海上，到了蘇俄革命以後却需要內遷到作爲俄羅斯心腹的莫斯科；土耳其在戰前可以把國都放在黑海與愛琴海的橋樑上，到了戰後却只能退到安哥拉了。

受「邊防建都論」影響的不僅是大公報的北平論，一切南京論，西安論，蘭州論，長春論者，也莫不引此以爲重要的論據。我們綜合上述中外歷史，事實上實在找不到一點痕跡。我國古代建都條件基於抵禦外患及鞏固邊防二因素的最初的主張者是西人柯氏，他認爲我國都位置初在西安，繼而北平，終至南京者，實因外患初在西北，轉而東北，更轉而東南沿海之故。但是我們溫一溫民族先祖發展的路線，便知道柯氏之說是出於附會的了。

大公報又認爲：「入民國後，東三省一向在半獨立的狀態下，終張作霖之世，雖冒親日之名，未嘗

損失大權利。及十七年北伐成功，國都南遷，十八年有中東路之變，二十年有九一八事變，這也證明遠統不如近防的道理。中國的邊疆半部臨海，大陸上就是東北與西北，國都在北方，適當邊防的要領。」這種說法是有毛病的。張作霖親日而保了東北二十年的安甯，只靠日寇暗中搜索而未敢明目張胆而已，誰能武斷他「未嘗損失大權利」？東北之失，可說是鴉片戰爭導其端，中日戰爭種其根，民國初元的分崩離析予其機，實與國都之位置無關。日本帝國主義成熟以後，其侵我乃事所必至，理有必然的，我們不能以遷都南京爲罪；而且我們如果早一天統一，而同時國都也不南遷的話，則除在北平產生第二個張作霖以外，中日之間一定早就破裂，若是後者的話，那末東北事變更要早一天爆發吧！

### (三) 對於建都應有利於開發論的意見

龔德柏先生提出：「因要開發西北故必須建都西安」。龔先生認爲建都應以利於開發爲目的。

關於開發西北的問題，個人有一點意見。目前許多以歷史目光、政治目光來談開發西北的，都是離開了現實情況而以理想爲基礎的，這實是很大的危險。但此非本文範圍內所應論，按下不談。

可是如果以爲開發西北就必須建都西北的話，不免更有些開玩笑笑了。戰後滿目瘡痍，東南何嘗不需要重建？中原何嘗不需要復興？西南草萊初闢，距離現代化甚遠；東北資源豐富，已受衆認是全國寶藏之區；又那一處不需要開發？龔先生顯然把開發西北在復興的任務中孤立並突出起來，並藉此以爲主張建都西北的附會。西安果具有建都之條件與建都的必要，亦決不能拿這一點來做理由的。

蘇聯革命以後，執政當局清楚的看出西境決非安全之地，但他們也不過從波羅的海口退到莫斯科，

而無人唱建都烏拉爾的高調。開發烏拉爾，在蘇聯建國史上，幾乎跟開發西伯利亞和伏爾加河、頓河、聶伯河諸流域同等的重視；但他們不需要以建都烏拉爾作爲開發的手段，而烏拉爾的建設也未因沒有建都而鬆懈了工程。

龔先生在其跟陳爾壽「西安與武漢」之辯中，瑣瑣屑屑的牽涉到糧食供應問題，煤鐵的生產問題，又復講到私人利害，憑良心云云，真是有傷大雅！

胡秋原先生主張遷都遷到長春，這除防日寇以外，自然也以利於開發爲主要的論據。這是完全無視其他一切更重要的條件的奇論，不必批評。

#### (四)對於建都應尊重歷史傳統論的意見

丘良佐先生說：「論『全力戰爭』者，謂除人力、物力、財力外，『史力』亦爲戰爭的重要因素。『史力』就是民族自信心的源泉。我國數千年來聖賢豪傑的事業無不以西安爲重心。現在我們每年到民族掃墓節，政府派了大員致祭黃帝及文武靈寢，卽所以追慕民族祖先，鼓勵民族精神之意。此我國唯一偉大歷史名城，實與我民族生命有不可分割的關係。」西安原爲我國文化之發祥地，而今滿目荒涼，廢墟遍野，令人一想到漢唐時的盛況，慕古之情，油然而生，自所不免。不過我們如果查一查古代民族發展的史事，爲什麼他們在開拓新天地之後就大都很少願意回到樸陋的故居了？——因爲向上與向前發展是人類的天性，故其所追求的常是更足以使人感覺生活滿足的地方。留戀殘骸與故步自封者只有殘酷地遭遇滅亡的命運。



我們正想問一問，爲什麼西安做了中國歷代國都近一千年，自唐朝以降，後來人就不想再回來了？很顯然的，西北已經不够繁衍的民族之生存與發展，爲求更美滿向上的生活，所以自然而漸遷移到東南方向來。

中國的古都和世界各大古都遭遇了同樣的命運。尼羅河上的金字塔影而今只能空照着幾個荒涼的古城，巴比倫靜靜地躺在底格里斯河畔做着沙漠邊的黯黯品，墨索里尼空懷着羅馬的古夢，結果也終於是被事實粉碎了。歷史是那樣的殘酷，他無情地告訴我們，當一個民族的文化發展到極度時，若是既迷戀其舊居又不肯把自己的生活與思想再推進一步，就只有被後起的新興民族所滅亡。羅馬等古國之衰亡就都是歷史上所留予後人的最清楚的教訓。

歷史是可以尊崇而不可以迷戀的，歷史上的文化遺產是可以吸收而不可以因襲的。西北是我民族的文化搖籃，鎬京、咸陽、長安之一度爲我們根據地，理所當然；但我們如果到數千年以後的今日，因偶發的思古幽情而暴棄了先祖費千年辛苦經營的新園地，實在外不足以趨合世界潮流，上有負於民族先祖銳意尋求發展的期望了。

### (五) 對於建都應就生活艱苦地區論的意見

大公報指出：「中國各朝代的歷史事實，建都北方的享國較久，建都南方的享國就較短，其中實在有一個大道理。因爲南方較富，政府設在財富之區，其施政標準就較奢寬，派員課稅就較繁重，國家艱難，民生疾苦，皆不甚感覺真切，就會出亂子。反之，政府若設在北方較貧之區，其施政標準就較樸實

，就比較知道艱難辛苦，而政簡民治，就自然國祚綿長，這是古今不易之道，說穿了實在並無神祕。我們懂得了這道理，太富庶奢麗的地方不宜建都，自然我們也不主張到沙漠不毛之地去建都，而折衷於富貧之間的北方纔是適於建都的地方。大公報從中國歷史上尋出了建都應就生活艱苦地區的因素。

主張建都北方的人大都以北方氣候寒冷，民風樸實耐勞，故適合於建都的條件。這在主張以西北的蘭州和西安爲國都者尤然。

雖然大家一致的態度也僅僅只把這當作一個附帶的條件看，不過我們以爲這個條件連附帶的意義也沒有。

簡單的理由：所謂「歷史上建都北方的享國較久，建都南方的享國就較短」根本是一種錯覺。在中國古代，南、北方因開發之先後，原未可以相提並論。國都南遷的諸朝代本已成了殘局，其享國較短的基本原因應求諸其建都北方的時期中。而且西北之漸變荒涼是南方更適於生存的結果，民族逐步南遷不能視爲西北衰落的原因。中華民族不向前進則已，他如是向前進的話，東南財富之區一定要被開發。奢靡爲人類富庶以後所難免的流弊，而樸實的民性原來就是民生艱難的反映。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從孔孟起就知道令人民「富之」了。「富庶」無罪，而奢靡也並非是不可救藥的病症。

說古代吧，從史書上就可以找到咸陽那種豪富繁華的事實了；然而東南方更具備豪富繁華的條件，於是蠻荒的南方一變而爲奢靡，早熟的北方，反自安於樸實。巴黎不能因少數上流人物所造成的罪惡而被遺棄，美國非不愛其偉大西北而終傾其全力於東南沿海富庶地帶的經營。我們爲什麼對於歷史上的古都，連古人也不願久居的古都，到了現代却還要過份加以留戀呢？

還有一層，「富庶」是國家施政的目標，「奢靡」是社會的病態。在不合理的社會中，奢靡不一定依賴富庶爲條件，在合理的社會中，富庶到極度也未必會奢靡。而我們三民主義的社會，正應該做到富庶而不奢靡的地步，此與首都地點無關。

### (六)對於幾何中心論的意見

張其昀先生有海都南京，陸都蘭州之說，他主張陸都蘭州的主要意見是因爲涼州是全國的幾何中心，而蘭州是接近這中心的唯一大都市。我們首先要代爲說明的是，張先生以海都陸都並論，而並非無條件的陸都論者。但我們現在先對陸都發表一點意見。

上面曾經說過，一個國家的中心決不能純從地域上來看，而是應以人民的分佈狀況來看的。法蘭西的地域中心在納維爾，美國的地域中心在米蘇里的堪薩斯，俄國的地域中心在新西伯利亞城，至少也得在歐、亞分界點上，只是若要把他們在這些地方來建都就匪夷所思了。幾何是數學問題，地域中心是地理問題，而國都却兼含政治問題，也就是文化經濟與國防的問題，不得混同的。

至說蘭州爲「水利淵藪」，我們可惜缺乏數字來說明洮、湟、大夏諸河水利在全國所佔的地位，我們也缺乏數字來說明洮、湟、大夏諸河的水力富源及得長江上游的百分之幾？

## 四

在對建都論諸說提出批評之後，願再就原則上對於建都的條件加以綜合的說明。

## 從古今中外對國都的選擇上找出具具有主導作用的條件

我們以為一切方位論、氣候論、邊防論、開發論、歷史論、幾何中心論都只能作為建都的條件之一，而其中方位論與幾何中心論幾乎連條件都不够。

如第二節所述，歸納中外古今擇都的事例，可以看到下列幾點是有意無意的被作為選擇的標準了：  
①是地位適中，②是歷史悠久，③是文化中心，④是經濟豐裕，⑤是交通便利，⑥是位置安全，⑦是人口集中，大概說來，少有超出這七點範圍之外的。

我們是不是按照上述七點來作為建都的選擇？這是不可能的。以目前中國而論，我們很難找到一個地點可以具備上述七條件的半數以上。所以我們只有就輕重之間和主要的和次要的分別來加以比較。

決定這七大條件的取舍的，是一個國家所具有的特殊性，這就是所謂國情。國情是各國所不同的，而且又是因時而異的；在建國的意義上，他必須兼顧到對內與對外的適應，即求得政略與戰略上的協同。

第一、國都是一個國家的神經中樞，故建都的第一目的是要總攬全局利於施政，所以他必須在一個中心地點，能够四面八方可以顧到。然而國家的寶貴資產不僅是死的「土地」，而更重要的是活的「人民」，以現代目光來看，最重要的無甯說是現代化的經濟基礎。所以作為一國發號施令的政治中心，決不是地域上的中心，而是文化上的中心；不僅是文化上的中心，而更須兼及經濟上的中心，至於人口集中，人才薈萃，交通便利與產業發達就都是文化、經濟中心的外貌。

第二、國都是一個國家的安危所繫，故建都的第二目的是在於對國防上的適應。所謂適應國防，並非一定要把國都武裝成爲一備要塞；固然國都也不妨經營成爲一個要塞。他如果本身不能具備作爲要塞的條件，可以用外衛據點來鞏固他的安全。在這一方面，一國的特殊性是必須重視的。國力有強弱之分，故在國防的意義上有攻勢與守勢之別。德意志爲四戰之地，故其國都以居中央爲宜；英美力足以禦外侮，故其國都可以暴露於沿海地帶；然而革命後的蘇俄和第一次大戰後的土耳其就不同了，他必須覓取比較安全的地方，免得一旦有風吹草動，神經中樞立刻受到震動。我們的國防自然是守勢的，在基本上恐怕到了戰後還是如此，所以我們的國都不宜過分暴露在前端，而應求相對的安全。所謂求安全，決非是退到「勘察加」去；所謂相對的安全，是需要既可以適應國際形勢而又無大損於其他的必要條件。

政略與戰略的統一，是決定建都問題的第一關鍵。

我們在此要談一談中國領域以內的軍事地理形勢。

論形勢，近人每喜從方輿紀要之類書籍或歷代帝王戰爭史去尋取門徑，這是大有問題的。方輿紀要在其產生的時代的確是一部不朽之作，然而現在一切條件都變更了。第一、從前的「天下」小，戰爭的範圍限於中國這小圈子以內，所以論軍事形勢，無非南對北，東對西，燕晉對江南，巴蜀對潼洛。現在這一地域的條件是完全變更了。中國內部已經統一，我們的目光已在國際方面。第二、從前的戰爭只限陸地，而近代則擴展及海洋，尤其是空軍的發展益使戰爭的本質變了立體化。戰具的革新將大大影響了古代的軍事地理的觀念。

由於第一點，所謂「據上游之勢以臨馭六合者，非今日之直隸乎？」「朔方不守，河西不固，關中

未可都也。」金陵可爲創業之地，而非守成之地也。局促於東南，而非宅中圖大之業也。」按江南以江淮爲險，而守江莫如守淮。」河北所恃以爲險者，黃河也。」雖然有些觀點在原則上仍不無價值，但大體上均已不合現勢。由於第二點，所謂「高屋建瓴」，「表裏山河」，「憑高據深」，所謂「腰膂、肩背、咽喉、津要」諸形容詞，亦都因時空條件的不同而失掉了原來的意義。

所以我們無論對於長安、北平、或南京，再也不應該撈拾古人之說來作爲此地今時的論據的了。

## 蘭州、長安、洛陽、開封、武漢、北平和南京的比較

我們於是就我國現有各假想的國都地點來加以一番考察。

第一、從西北說起，首先是蘭州。但西安之建都意義和蘭州相差無幾，所不同者蘭州是離中國本部更遠些，故對這兩個地方不妨相提並論。蘭州是西北的門庭，而西安是西北的堂奧，（張其珣說）主張建都西北者，除因其爲民族發祥地以外，更有足以向中亞大陸發展之說。我們覺得中國的當前急務是確保既有的產業，且慢談向外的拓殖，何況中亞爲一片荒漠，我們即使高坐在帕米爾高原上，也不足以恢復吉思汗時代的盛況了。整個西北的人口佔全國的十分之一；遠離了十分之八九的人口中心而把國都置於荒涼地帶，中外古今都無先例可援。自然我們要固西北之防，更要開發西北的寶藏，復興西北的舊業，但是西南東北與東南，隨處皆有外患之虞，我們又豈可着眼於西北一隅？總之，我們祇須努力使荒涼的西北改觀，以固邊防，建都於此則大可不必。

第二、再進到關內來，這地帶有兩個古都，洛陽與開封，亦可相提並論。河南在古代久有中祿之目

，雖因東南之開發與華南之新興已漸失其中原之意義，但自交通發達以後，還不失為一個四通八達的中心地點。洛陽爲中國有數的天險之地，開封且較長安蘭州更可以兼顧沿海地帶；所可惜的是數千年來的黃患始終沒有能澈底的解決，以致豫東經常爲黃水所蹂躪，其水旱的頻數史不絕書，因而弄得民生憔悴，滿目荒涼了。國都究竟不能完全不顧物質設備的完備，所以洛陽與開封雖遠勝於西安與蘭州，仍非理想的建都所在。

第三、是長江中游的武漢。武漢建都的優越條件是人口與物產兩皆富厚。現在我國人口密集的地帶一在巴蜀，一在兩湖，一在江浙，而武漢適得總縮之勢；他有橫貫的巨流，有連結南北的大動脈，水陸兩便。可是他唯一的缺點是被隱藏在漢水盆地，不足以言向外開展；不過論其安全性，則較東南沿海多一層屏障吧了。

第四是北平。北平是中國近代六百年的舊都，就黃河流域以北這一範圍來說，它具有優越的形勢，距海二百公里，故又兼有海港的意義。就其周圍環境說，是中國礦藏最豐富的一個中心地域。在其對全國交通的意義上，他的好處是容易控制東北，同時他的弱點却是離開中華民族近千年來的新田園太遠。

第五是南京。不問南京是中國的古都之一，同時長江下游在近百年來飛躍的發展中已隱然成了金融產業的中心，而人口的密度也佔了全國的首席。長江下游之繁富不是偶然的，他是近代海禁大開以後的幸運的驕子，上海即使不是理想的良港，而乍浦亦在其近側，所以如要把握中國未來的命運，建都於是最理想的。在交通上，對東北的陸上交通雖較遠，但還有海上的捷徑；同時其位置離徐州和連雲港亦近，賴隴海路之貫通，對於西北也不致過覺鞭長莫及。然而他惟一的缺點是地處濱海，百年來飽經憂

患，尤其是今次日寇的入侵，海防一破，立刻遭遇兵臨城下之危，這種教訓自然也不能不加以考慮。

## 結論——應該根據戰後需要在南京、武漢與河南之間選擇

我們在蘭州、西安、洛陽、開封、武漢、北平、南京諸地點比較之下，結論是：要有一個完全符合理想的國都是不可能的。我們只能從比較的觀點來決定取捨。

如前所述，南京最適宜於建都的條件，他僅有的缺點，是地處沿海，外患堪虞。武漢有安全的好處，得人文之中心，但又不足以總攬全局。（但這點比北平要强些）河南位置全國之中，可惜他本身又不够建都的物質上的要求。但是無論如何，我們必須要在三者之中選擇一個。

我們在此要提出大公報上一個寶貴的意見：他說：「假使我們的勝利是完全無缺的，收復了東北四省，恢復了朝鮮獨立，我們應該建都北平。那時北平天然是中國的神經中樞，既當東北西北的大陸要領，也不遠於海洋，天然是中華民國的國都。假若勝利有折扣，東北收復還有問題，我們應該建都西安。但建都西安，必須儘速完成隴海路，加緊修建北起新疆南迄雲南的大鐵道，並多興水利，以恢復歷史上「八水繞長安」的盛況。」這裏只要除掉北平、長安的字樣，他所顧慮到的抗戰勝利究屬於怎樣一種形式這問題，很有深意存焉！

抗戰勝利是「完全無缺」還是要「打些折扣」這一問題，在目前看決非過慮，因此建都的問題也必須跟這一個問題來同時考慮。只有這樣的討論才能產生出一個最合國情也就是最足以適應內外情勢的國都出來。所以，我們在此時來討論建都問題，只能求出一個原則，而不能遽作肯定的論斷。基此同一理



由，目前對於戰後經濟建設問題的討論也不能全憑主觀的理想，而完全無視於抗戰結束時期所可能發生的一切變化。

我們的結論是：假使我們的勝利是完全無缺的，朝鮮獨立了，東北與台灣澎湖收回了，日本帝國主義澈底崩潰了，我們可以無憂的建都南京，如果勝利有折扣，我們只有內遷武漢，以留進退的餘地。如果黃患能澈底解決，中原的繁榮恢復舊況，則我們可以捨武漢而就河南汴洛間選擇一個地點。

(三十二年十月)

# 附錄一

## 建都小論

### 從大處着眼

建都問題引起了廣大的論戰。這問題，應是在原則上易於求出結論的問題；然而不然。

爲什麼？多數人像瞎子摸象一樣。首先他們對於象之一足，一鼻，或一耳，又似乎早就熟知了的；於是摸住了一足，一鼻或一耳，便愈覺是象；更從主觀上去推論，那必定是象了。

多數似乎少談原則上的問題，多論分枝上的問題，於是什麼歷史，氣候，人口，地域便都成了一家之說的根據。他們竟不能發覺，這歷史，氣候，人口與地域，猶之象體上之一足，一鼻或一耳。

先拘成見再找理由必是牽強的，先得結論再尋證據必是顛倒的，只見樹木不看森林是狹隘的。

十多前的社會史論戰不就是如此麼？許多參加討論的人不就是先確定了某階段的社會的性質再去找論證的麼？他們的努力自然是徒然的，倔強有什麼益處呢？成見終於要在真理前粉碎的。

有人指出，北方人主張建都北平，南方人主張建都南京，西方人主張建都西安，漢水流域人主張建都武漢；我們希望這不是事實，因爲萬一在討論者果有此意的話，美國人將勸我們建都×××。



請大家從大處着眼，先從原則上求定論，然後談具體問題。

## 古已有之

國人之中「古已有之」之毒也深矣！比如說，主張建都××者，必說××之爲國都也，是古已有之的。

現在究竟就是現代啊！如果古今的一切條件不變，自然古都也不妨作爲今都，無見異思遷之理；如果古今的一切條件都變了，而且大大的更變了，則歷史便成了陳跡。

時代實在是變了，現今有年紀的人大都不免有一種慨嘆，他們總念念不忘於他們那一代人所有的敦樸的古風與簡單的生活費用，以爲現在的一切莫不是反了。這回憶與嗟嘆有什麼意義呢？猶之，在一切條件都變了的現在中國，古都除供歷史家的探索以外，還有什麼現實意義存在着呢？

中國這國家，古今的條件主要變了那些？首先，在對外關係上數千年糾纏於西北部的大陸戰爭已轉變爲近百年來東南海陸戰爭。次之，在對內關係上，長江流域的繁榮已取黃河流域而代之。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斷非人力所可逆拗的。人們常說，人力可勝天工，這句話要在一定的條件上才會有意義。此條件，即主觀希望在客觀上所具有之可能性。這句話是對於怠惰者的有益的教條；說這句話的人決無旋轉乾坤的企圖。任何民族在發展上只有朝更適合生存的地帶走，反其道而行之者多衰亡。

古今條件不變的，五百年來的英國是典型，次之，是現在的俄羅斯與法蘭西。古今條件變得最大的，除「歷史上」的文明國家不計外，土耳其、中國都是典型，中國變了什麼？蠻荒變了樂土，繁榮化作

荒涼，還有，天下變大了，中國的天下變了整個世界的天下。

一切建都的條件都變了，「史力」於我何有哉！

## 安內與攘外

談原則，有人提出了國家的任務是安內與攘外，故建都應以有利於此二大任務者為取決的主要條件。這論點可說是抓到了癢處。

但一提到安內與攘外，又不免有人聯想到內戰與外戰的問題上去了。我們要指出，這是兩個不同的命題下所產生的不同意義的名詞，倘若混和起來，問題就攪不清了。在建都的命題上，安內是充實國力的意思，攘外是外禦其侮的意思；因之，我們可以說，充實國力自然是外禦其侮的必要前提。在後一命題上，內戰是內部紛擾的意思，外戰是集中力量一致對外的意思；因之，我們可以說，一致對外第一要緊，內部問題應該求和平合理的解決之道，只有內部團結才能增加對外應付的力量。

據此理由，如果有人在此中突然塞進一個「國防第一」的名詞進來，那末這名詞對於「安內」「攘外」究竟具有何種關係呢？

當然不免有人說，「國防第一」就是指「攘外」。然而我們倘使進一步問：國防力是從何產生的呢？那他們恐怕也就不得不作如下的回答：——

國防力是發乎自身的，只有有效的安內才能建立高度的攘外力量。

## 天子守邊疆

前一道理一經辯明，我們便不難了然於「以首都當要塞，以天子守邊疆」主義是多餘的了。

古有「遠統不如近防」之說，「天子守邊疆」的建都論就是以「近防」爲立論根據的。其實所謂「遠統不如近防」主義也者，在弱國可說是不量力，在強國可說是不度德，都是不足爲訓的。

從「遠統不如近防」主義引申出來，自然就會覺得今後我們建都何處，應該看我們今後的國防那裏最重要；所以首都的位置應該近於邊防。這是大公報一貫堅持的主張，這主張大有問題。在國際形勢五年一小變十年一大變的今日，作爲一個國家最重要的邊防地區是常常會移動的；而國都倒底是具有相當永久性的東西，決不能準備跟着國際形勢的演變而搬來搬去。其次，一個國家常常不止有一個重要的邊防地區，即使可以擇其最重要者而都之，則愈近於此必愈遠於彼，愈近於彼又必愈遠於此。試想清代道光以下諸天子如果要找一個最重要的國防地帶去守的話，不但會感到顧此失彼之苦，而且勢必建一個流動性的國都，才能應付強隣交替進伺的七十年殘局了，豈非笑話。

## 臥室

一個國家譬如一所住宅，國都就譬如主人的臥室。主人不會住在空曠園圃中，也不致與司關者相共處。

## 「國防第一」

倘使所謂「國防第一」不爲「攘外」所專有，而爲「安內」與「攘外」所共有，倘使認清國防的作用，是從內部創造力量，俾於必要時用以對外運用的話，那末，我們亦同意建都應以有利於國防爲條件。國防力的構成因素是什麼？——經濟、文化與武力，而三者之中佔有主導作用者無疑是經濟。

國家之要素有三，土地，人民與主權。只有具有經濟原素最豐裕的土地和數量最衆的人民組織起來，才能通過經濟力發展的橋樑，達到確保主權的理想。

首都爲國家發號施令之地，對於他的富士與衆民，當然「遠統不如近治」。此道理，以視今世之英、美、法、德、俄諸大國，均無例外。

近則利便。故首都必被衆民簇擁於富士之上，才能收事半功倍之效於國防力量之創造。有了國防力，「守邊疆」就是「將軍」們的事情了，這就無須乎「天子」。

## 計 劃

許多人太看重了建都可以促進建設的作用，推而廣之，如說：「××雖然交通不便，但一建都，專車就不成問題；」「××雖然人口很少，但一建都，人口自然集中了；」「××雖然地力貧乏，但一建都，產業也就發展起來了；」……

如此說，國都真是國家的萬應靈丹，可治百病。

事實上是會如此的。

只消看看 總理的實業計劃，再看看蘇聯的五年計劃，就可明白，具有遠大目光的設計者是如何重視着某一地區的經濟原素之潛力。在俄國未有鐵道以前，莫斯科就「命定」是一個全國鐵道大中心了；莫斯科之成爲鐵道大中心，決非因爲莫斯科是一個首都，而是因爲莫斯科平原從幾千年前就具備了作爲全俄交通中心的條件。儘管中國歷代古都什之七八在黃河流域，但黃河流域的人口在全國比例上只有每况愈下，各種新興產業只有在黃河流域以外才有順利發展的可能。一切主觀上的努力如果不服從於客觀上的可能性，是事倍而功半的。

那末，我們把執行計劃的中樞放在什麼地方才是相宜呢？

## 雅·健·深·雄

梁啓超論建都，有「雅·健·深·雄」四字訣。

據我們看來，若就此四字而論，「雅」是附屬的條件，他可以借後三條件以俱來，不必重視；「雄」指形勢，應看作次要的條件，「健」指地力之深厚，易圖謀創造，「深」指地位之適宜，易控制全局，二者皆應看作主要的條件。

## 限度

固然，都邑之文化發達、交通便利、產業振興、人口集中……都可以視爲建都的原因，也都可視爲建都的結果。

但是，這未可看作鷄生蛋、蛋生鷄一樣；若分主從，具有主導作用的應是前者，而不是後者。還有更重要的一點意思。數年來重慶的一切發展雖然也可以作為建都的結果看，但是他終必受到時、空兩方面的限制。在時間上，只消特殊的因素一消失，這發展的頂點便到來了；在空間上，發展到達某一階段時，這限度也便無法擴張了。所以，在同等努力之下，愈具備高度的經濟潛力的地方，他發展的強度亦愈高，他對於特殊因素的需要亦愈低。

在戰都重慶，幾年來文化、交通、產業、人口，什麼都發展了，但是到了戰後，將是如何呢？而且，重慶（及其週遭）究能容納多少人口，創辦多少產業，開展多少交通……呢？以重慶為中心的地區在全國比重上佔有多大地位呢？

## 新 宅

晉、宋的偏安東南，是「遷」都，不能看作「建」都。這意見是很對的。因為，在其時，中華民族繁衍的中心地域是黃河流域，好好的國家不會把國都離開了他的寶庫。

但是自宋代以後，為什麼大家就永遠不想回到老家去了呢？是因為新的鋼骨水泥大廈已在旁的地方建立起來了。

## 生而知之與學而知之

對於古都之研究，給予現代的建都論者什麼意義呢？——着眼於古代的一切條件，去探索古代王朝



何以選擇某地作爲首都的原因；據此原因，再着眼於現代的一切條件，去尋覓現代建都的理想地點。不必說得，如是古今的一切條件大體都無什麼變動的話，我們自然就可以承襲古人給我們的遺產。

不說國都，就看中國各省的省會，各縣的縣城，各鄉的街市，先民不見得一一都經過反復的辯論，縝密的研究，但都自然而然的創造着了。

有生而知之者，有學而知之者。先民從狩獵、畜牧時代開始，就知道選擇他們的理想地帶以定居部落了，這可說是「生而知之」的。現代的人類有歷史的借鑒，有新發現的知識，於是凡對一件事，可以用經驗和學理配合着去尋求合理的答案，這可說是「學而知之」的。

當然，學而知之者一定比生而知之者高明。但有時却有例外。

## 國家興亡

國家興亡另有一番大道理。如果強調建都地點對於興亡的作用，甚至把二者看做因果關係，有時便會離題益遠的。你真會相信英美之強盛是由於建都沿海，漢唐武功是由於建都長安所致麼？

在基本上，國家之興盛依賴於一個合理適時的政策；而國都如得行使治權之便的話，他當然就不無促進興盛的作用。

一個向上的國家；「天子守邊疆」也好，（要是天子喜歡這樣的話）以便利內治爲擇都之主要條件更好。一個向下的國家，地點最好的國都也不能改變他的命運，還談得到以國都代要塞麼？

# 附錄二

## 戰後建都問題

過去半年中，討論戰後建都問題的文章佔了全國報紙雜誌的許多篇幅，雖然衆論紛紜，莫衷一是，但這無疑爲國人熱愛國族心理的一種流露，而尤其是在準備迎接最後勝利的空氣中所應有的一點鼓盪。日前居院長在中、法、比、瑞文化協會演講中，曾特別提出「戰後首都應否建立在南京」問題提出指示；我們探以未得其詳爲憾，却願於此就原則上提供一得之愚，以爲時人討論的採擇。

決定一個國家選擇首都的道理其實也很單純，那就是求其對於該國內情與外情上的適應。在適應內情的條件上，國都應顧及有利於富國強民的政令之推行；在適應外情的條件上，則又須顧到當時國力之強弱與國際地位之高下以定進退。進一步言之，前一條件的目的主要在養民，後一條件的目的主要在保民。易言之，對內的任務在創造國富，對外的任務在充實國防。自然，所謂養民與保民，國富與國防之間的關係，是統一的而不是對立的，是相輔相成的而不是矛盾的；故在建都的考慮上，也就應該二者兼顧而不能固執其一的。



構成國家之要素有三，即土地、人民與主權，所以國家就必須善用其土地與人民，俾克建樹其高度之權力。首都乃國家之神經中樞，所以在地點的選擇上，亦就必以有利於上述二大任務者，方稱合格。然則何以而始能善用其土地與人民呢？這就必須其地得發號施令之利便並擁有充厚之人力和豐富的經濟原素。何以而能鞏固其主權呢？這在弱國就須兼顧到比較安全的條件，而在強國則是可以少加考慮的。據此而論，如果就原則上再進一步問：在國都的選擇上，適應內情與適應外情究竟孰為主要？我們便可回答：當然以適應內情為主。何則？因為土地與人民乃孕育主權之原動力，善用其土地與人民者，經濟自能發展，國防自能堅強，其主權也就必能鞏固。換言之，除有特殊外患的國家必須相當重視其安全性以外，建都地點的選擇幾乎可以完全注意於如何適應內情的問題；而其結果也自然不致有背於外情的適應的。

以此原則接觸到實際問題上。抗戰勝利以後，中國固然不能說立刻就成了這地的強國；但是至少也可以說，中國已剪除了鼾睡臥榻之旁的強敵，並具備了發展成爲強國的有利條件了。於是，我們在戰後的首都，應該可以本自身之所需要，選擇利於總攬全局的富土衆民所在以定居了。我們不怕五年、十年之後再有新的強梁的敵人，我們只怕五年、十年之內不能除舊布新，發奮圖強。因之，我們應該無須過份顧慮到安全的問題，亦不必發生「以天子守邊疆」的奇想。只要能埋頭努力以致國富民強，就必能充實國防，就不致再受外侮的欺凌。至於如何才能獲得致於國富民強的最高效率呢？則又首先必須求其發號施令之所在「得地之富」與「得民之衆」，應無疑義。

我們主張把首都建立在地富民衆的區域，決非爲了貪圖物質條件在享受上的優越，而是着眼於一切

建設事業的最高效率的獲得。這一建都的理由，世界各民族自進展到農業社會以來，幾乎是不期而然的採取了同一的方針。其例如中國古代的建都多在黃河流域，英美國都之在沿海富饒地帶，不勝枚舉。

中國戰後建都問題的結論是：倘使沒有眼前的外患，我們只有不蹉跎不怠惰以迎頭趕上，奠定國基，上述二大原則民之衆」二條件；倘使就心未來的外患，我們只有不蹉跎不怠惰以迎頭趕上，奠定國基，上述二大原則仍可作爲選擇國都的依據。抗戰結束以後，大家盡至善之努力，循至高之效率，創至大之成就，不必害怕，也不要妄作奇想。如何而能獲致最高的效率？當須建立具有「富」與「衆」兩個條件的神經中樞。

（東南日報三十三年一月二十日社論）

戰後建都問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8 7668B

三四



# 論 建 都

版權有所翻印必究

每冊定價

著者 谷

發行者 江南出版社

福建南平書錦坊五十八號

福建南平書錦坊

印刷者 東南日報印刷廠

經售者 各大書局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六月一日出版

風

建省圖書雜誌審查處圖書審查證延圖字二二六號

如蒙惠顧請向上海舊書店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六月一日



上海舊書店

內 冊數  
售價 0.20

1615578